

外国语言文学文化论丛



语言·社会·生态

姜瑾著

——社会语言学动态应用研究

东南大学出版社

语言·社会·生态
——社会语言学动态应用研究

姜 瑾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社会·生态/姜瑾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12

(外国语言文学文化论丛)

ISBN 7-5641-0579-8

I. 语... II. 姜... III. 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4861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总印张: 48.25 总字数: 1343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读者服务部调换。电话:025-83792328)

作者简介



姜瑾，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6年12月出生，江苏海门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从事大学英语教学26年，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出版专著两本，主编、参编教材四部。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社会语言学的多个方面、语言与医学的交叉学科及英语语言教学。现正从事生态语言学方向的研究。

序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与社会学科的交叉领域。它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同时也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考察语言”。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主张把语言放到其得以产生和运用的人类社会的广大背景中研究和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算是一个独立、完整同时又范围广泛、边缘模糊的学科,研究方法多变,研究手段互异,研究模式具有兼涵并包的特色。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语境中活生生的语言使用现象。虽然该学科从确立至今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其内部整合性不断增强,边缘有所扩大。它独特的学科性质及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的能力不断发展并备受关注。

由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特点是应用性、本土性、时代性及广泛性,因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丰富多样,可以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社会的各个层次、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各个部门、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覆盖一切可能的将语言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可谓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分别在法律语言、广告语言、诊断语言及广义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等领域得到充分实现,生态语言学的部分研究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语言学的延伸拓展研究。本论文集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因而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研究过程。研究肇始于对英语实际使用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变异现象,即“东非英语”的研究,随之延伸到医生语言及医患对话言语行为,外语教育与双语教学,最近从多语文化着手开始拓展到生态语言学方面的探索。

本论文集主要以三方面的论文为主题。第一大主题是对生态语言学及语言变体的研究,这一主题包括了作者在英国剑桥做访问学

者过程中对社会语言学有极大交叉面并备受欧洲语言学界和官方关注的生态语言学的初步研究,科研成果包括对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综述,对英语通用和语言生态之间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论述,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持续性现象的多角度分析,以及对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多语现象中所展现的民族或种族语言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描述了在非洲工作期间感到颇为有趣的“东非英语”这一英语变体的文化特征,陈述了网络交流语言符号的应用,以及对目前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中的一大亮点,即双语教育的纵横探索。第二大主题是将社会语言学与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相结合形成交叉学科研究,科研成果包括与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的合作课题问卷调查报告,对作者本人在医院工作亲身经历以及对苏州各大医院门诊室录音从语言学角度的分析,以及二十年医学院工作中对医生语言修养问题的调查研究。通过个案分析表明:在医院诊所语境中,由于存在认知模式和知识背景方面的差异,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话语交际可能产生障碍,还可能诱发另一个社会语言学因素——权势概念的产生。论文主要分析探讨医患间的话语模式及言语行为和交流沟通最后达到解决问题之目的。第三大主题为社会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英语语言教学,其中包括英语语言教学中语言政策、规划、内容、形式、语境、交际目的等语言教学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关系,文化渗入,语言测试中语言学习者认知、结构、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不足之处、教学策略、未来教学改革的方向以及对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方面提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三大主题显示了对语言、社会、生态的社会语言学动态研究。

姜 瑾

2006年12月于苏州

目 录

语言生态学研究纵横谈·····	(1)
英语通用与语言生态·····	(17)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持续性·····	(27)
多语现象中的语言认同·····	(36)
“东非英语”特征之浅见·····	(48)
双语教育面面观·····	(56)
网际交流语言符号:网民的 LINGUA FRANCA?·····	(68)
医生语言——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突破·····	(84)
医生语言修养之管见·····	(97)
医患晤谈中角色的冲突与和谐·····	(105)
失语症患者语言康复中社会因素的临床调查·····	(117)
医学英语术语概论·····	(126)
The Use of Maxims for Cooperation in Chinese Medical Interviews·····	(141)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 Assessment study in Patients Preference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154)
从“模拟国际会议”看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	(175)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183)
加强翻译教学 促进文化交流·····	(191)
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石化现象”之探讨·····	(198)
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学习动机及其相关因素的定量分析·····	(211)
迁移作用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	(225)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交流·····	(231)
论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	(240)

语言生态学研究纵横谈

姜 瑾

摘 要 语言生态学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是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本文论述了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历史、国外语言生态研究现状、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视角以及语言生态研究发展趋势。语言生态学的建立是将语言学与社会及自然学科结合形成边缘学科或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是语言学理论和应用价值的不断完善,是全球化形势下人类与自然新型关系和人类语言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语言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对保护语言多样化、语言持续性及和谐社会将有相当大的贡献。

关键词 语言生态学,语言和环境,互相作用,和谐社会,濒危语言

一、引言

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又称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英汉语言学词典将它定义为“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即使用它的社团——之间的互相作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对语言生态的关注源于人类对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后导致生

态危机所产生的思考。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的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就好像自然界特定生物和非生物的生态。生态语言学借鉴生态学研究的原理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当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Einar Haugen, 1972)在斯坦福大学学报发表论文《语言的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论述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的概念时,他对此术语的定义是“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认为真正的语言环境是将该语言作为交际语码或符号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自此开始,“语言生态”作为一种隐喻渐渐地为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所接受。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的学者更多地讨论了语言生态问题,并产生了另一术语: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在世界各国研究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语言生态学研究现已超出其简单的隐喻意义,渐渐衍化为一种崭新的语言生态观,将语言现象放在生态文化背景中看成一个整体的开放型生态系统,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与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强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关系以及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基础理论体系与应用理论体系正在得到不断的完善。

语言生态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但从根本上来说它的主要任务有两大类:一是语言与环境的关系;二是语言多样化问题。它更着眼于语言变化发展过程中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正如豪根所说,语言生态研究覆盖了大多数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语言使用中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它的内涵也包括了普通人对语言发展和维持的普遍关注,它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科学,它超越了对语言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而更多的是前瞻性(predictive)或治疗性(therapeutic)研究。该学科的建立是将语言学与社会自然学科结合形成边缘学科或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是语言学理论和应用价值的不断完善,是全球化形势下人类与自然新型关系和人类语言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语言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将对保护语言多样化、持续性

发展和谐社会将有相当大的贡献。

二、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历史

早在1912年萨丕尔(Edward Sapir)就进行了“语言与环境”的反思。虽然他当时没有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但是他最早企图将语言学的研究超越对语言结构、发音、词义等的描述,建立语言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语言的词汇才能最清楚地反映讲话者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一种语言的整套词汇确实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所关注的观点、兴趣、职业的复合性创造,从人们随意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征和社区文化特点”(Sapir, 1912)。对于萨丕尔来说,自然环境就包括了“地理特征、气候雨量”以及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如一个地区的动物群(fauna)、植物群(flora)及矿物质资源等。更重要的是萨丕尔关注的不限于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之间、多种语言与文化之间、多种语言与它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提出了语言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意识到了他本人所称的“文化语法相互作用的广泛多样性”,以及各个领域的“方式计算”、“实物概念”和“性别语言中不同的社会态度和语言结构”等。而时至今日,语言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还是“相互作用和多样性”,因此,即使萨丕尔当时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隐喻或学科理论,但他还应该被看成语言生态研究的开拓者。

豪根在1970年的一次国际语言学会议上首次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将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路引向将语言作为索引来参照的世界。他认为“语言一般只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中,只有在语言使用者相互之间产生关系并与周围的自然社会环境相关时才起功能作用”,因而部分的语言生态也属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而某个语言生态体系状况主要由学习、使用、传播该语言的人们决定。

继豪根之后,翻译学家史特纳(G. Steiner)于1975年又提出了语言多样化问题。“为什么全世界人类的消化道进化和功能都一样,

每一进化阶段错综复杂的过程和背景也大致,而这种既一致又各具特色的哺乳动物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呢?”史特纳努力想用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概念来解答语言多样化进程之谜。自有史以来,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框架内,人类把讲着成千上万种无法相互理解的语言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语言多样化究竟有没有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妨碍人类进步”?“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发展”对语言多样化赋予更好的结果还是妨碍其不断地进化?他在世界各地研究了多种语言,然而还是没能解开复杂的语言多样化之谜,最后他非常合理地解释出“翻译的存在就是因为人们讲着不同的语言”。

韩礼德(H. A. K. Halliday)在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发言的论文《新的定义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中论述了生长、性别和物种在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中的自我表现形式,并提出语言学研究不能忽视语言生态进程中的作用,提出将语言研究作为生态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语言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模式,而生态语言学也成为语言生态研究的另一个等同术语。

上述语言生态研究的开拓创新者的种种观点都典型地突出了生态语言学的两大主题供语言学家继续拓展,即伴随着日益加剧的濒危语言问题的语言多样化研究方向和伴随着污染、物种灭绝和环境恶化问题的语言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方向,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在全世界各国不仅在语言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学术界展开,而且受到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普通人群的重视。

三、国外语言生态研究现状

目前语言生态研究在欧美各国及日本备受学术界和官方的关注。其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奥地利语言学家, Wirtschaftsuniversität 大学的 R. J. Alexandar, Graz 大学的 Alwin Fill; 丹麦语言学家, Odense 大学的 Jørgen Chr. Bang, Jørgen Døør; 美国语言学家 David Crystal, France C. Verhagen 及日本语言学家宫冈伯人等。他们在前人对语

言生态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语言生态学理论及研究方向,进一步充实完善了生态语言学体系,使之日趋成熟。

从当前国际上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趋势来看,下列焦点问题可以说是该学科的研究拓展。

1. 语言多样性、持续性及社会和谐

对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的认识起源于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生物多样性包含了三个层次,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而语言多样性也可以说是包含了该三个层次的类比。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巨大资源和财富。语言多样性是人类在发现世界、适应世界、发明生存技巧的过程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基本条件,起了储存器的作用。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它所储存的知识文化的灭绝。因而语言多样性意味着文化多样性,与非人类世界的自然多样性紧密相关。

语言持续性观点基于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复苏的研究,源于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思考的隐喻。与社会经济持续性一样,语言持续性与保持整个社会的动态变化发展及社会和谐有极大的关系,因为语言持续性是人类语言系统当前模式的逐渐变革过程,这种变革的目的是避免人类在全球化形势下双语或多语使用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种族抛弃自己的语言以保持语言接触中的生态动态平衡发展。各种语言相互影响,语法词汇相互借鉴,各社区文化生态得到不断延续。总之,语言多样性是语言生态形式保持健康活力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生态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语言多样性的持续能促使和谐社会的形成和维持。社会语言学先驱 J. Fishman 曾告诫道:“当所有的人都讲一种语言的时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综观历史,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民族为语言的主导地位之争或语言的存在与消亡而进行了民族争斗、战争,甚至造成国家分裂,而当年的殖民主义者也将对语言的霸权作为控制该地区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样,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也将民族语言的

优势视为标志之一,如非洲各国在独立后确定的官方语言。因此,对语言多样化和持续性研究有助于抵制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现象,在接受外来语的同时尊重民族语言的自然地位,正确处理本土语言和外来语之间的关系,传承世界语言的生态链,保持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以保证整个人类社会既动态发展又稳定和谐。

2. 保护濒危语言

生态语言领域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视点起源于社会语言学家 Fishman 的专著《逆向语言转换:对濒危语言支持的理论实践基础》(*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red Language*, Fishman 1991),把那些即将消亡的语言称为“受到威胁的语言”(threatened language),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 RLS,即逆向语言转换,其意思为希望通过采用人工参与的方式改变语言不断消亡的局势,它的本质和目标在于保持语言的多样性,更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RLS 还提出了实施该工程的八个阶段,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濒危语言恢复到正常状态。1992 年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 Krausse 教授将世界现存的语言划分为垂死的、濒危的和安全的三种。“鉴于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会构成对人类无可挽回的损失”,1993 年 11 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上将保护挽救濒危语言列为“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将其接纳为直接管理的项目,为全球对濒危语言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美国语言学家 David Crystal 十分强调濒危语言研究的应用性属性,甚至还提议创立一门应用保护语言学(applied preventive linguistics),以期通过这门学科将濒危语言理论、描写以及方法等方面的成果应用于每一种具体的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拯救。著名社会语言学家 J. A. Fishman 所编著的论文集《濒危语言能拯救吗?》(*Can Threatened Language be saved?*)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全世界濒危语言关注和研究的成果。Andrew Dalby 的专著《濒危语言:语言消亡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Language in Danger: How Language Loss Threaten our Future*) 指出了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亡的现实状况,论述了语言消亡与人类发展的关系、语言对于人类储存知识的重要性,以拉丁文的消亡为例探索了语言如何在人类追求自身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被曾经使用并主导的社区所抛弃,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语言与民族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现状,并强调人类保持语言多样化不仅是为了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召开了国际语言学专家的会议,对濒危语言的鉴别定下了9条标准,提出了保护濒危语言活动的具体建议,对各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全面展开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同世界各地对濒危的动植物保护和拯救的成果一样,语言生态中对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拯救也初见成效:曾经消失的希伯来语如今已经复活;一度濒危的爱尔兰语也正在恢复;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日本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都成立了专门基金和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对濒危语言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一些非洲国家也开始加入保护当地濒危语言的行列。这些国家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政治、经济、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种种原因,先后已有一千多种人类语言从地球上消亡。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现存的六千八百多种语言到本世纪末将有50%甚至90%不再被使用。在人类看来,每种语言都是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口中含的文化活化石,而一种语言的消亡将导致它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所代表的文化的丢失,从而导致全世界多姿多彩文化画面的缺损。因而,当今对濒危语言的研究、保护和拯救已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有关国家政府、语言研究机构、高校语言学教师等高度重视的课题,同时也成为生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3. 从生物学角度理解语言生态的含义

从生物学角度理解语言生态的含义,研究语言在生态环境中的进化、作用和影响,是语言生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在生态语言学这个研究视角上,语言学家更多的是给予对语言和语言实践的批评性

研究,对环境语篇的分析批评、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生态语法以及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等。

早在1970年,豪根在谈到“任何特定语言与它所处的环境的相互作用”时,就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语言学家 L. Jenkins(2000)在他的《生物语言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语言的知识、使用和进化与环境的关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语言学家 Saliko S. Mufwere (2001)的论著《语言进化生态学》是近年来在该领域里以克里奥尔语向英语的演变发展过程为例评述语言进化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认为“如同寄生物种一样,语言在使用者个体间的交际行为中形成”。语言接触使语言特征得以竞争、选择、传递,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适应是物种变化的结果,语言接触和相互适应是进化的核心,个体习语间的接触是进化的基本因素,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是进化的接触场所。语言进化过程受语言内部生态结构和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一个语言特征竞争——选择的重组机制。这一进化机制适合于一切语言的变化,而语言进化体现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正是不同生态因素作用的结果。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于1990年在希腊塞萨罗尼基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强调了语言与生物生长状况(growism)、种类特征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并告诫应用语言学家切不可忽视研究对象在不断增多的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从那时候开始,研究者对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生态角度进行了话语批评和语言系统的批评。许多语言学研究对语言系统中词汇的构成、词汇的含义变迁及语篇结构进行了微观分析,指出语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某些名词的命名可直接导致该物种的命运,如 Mühlhauster(1983)调查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语言中动植物的名称,发现由于受外来语的影响,澳洲大陆上许多有袋小动物的名称因带有“鼠”字样而使人们产生误解,将它们当成“鼠”类加以捕杀而导致这些小动物濒临灭绝。人类给事物

命名的依据往往以人类的行为准则来规定其他生命物质的属性和作用,因而很多动植物词汇及其对它们的解释以及涉及它们的物主代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导致人们的各种联想,从而决定物种的消亡或生存。从语法方面来看,把空气、水、石油、煤炭等物质用作不可数名词,也同样反映了人类潜意识中认为自然资源无限的观念,但从生态观来看,这些物质是不可再生资源。语言生态批评家认为语言系统应该生态地建构世界,而不应该纯粹体现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世界观。

生态语言学的语篇分析从生态学角度对语言中社会文化的生态意识及行为进行分析批评。由于语言反映人类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进程,因而语篇结构的形式选择和使用往往由人的意识形态决定,以实现对该社会的某种操纵和控制。生态语言学家 R. Alexander, A. Coatly, J. Døør, J. Bang 等对有关环境、动植物、食物以及有关环境的产生、政论和商务文本等的语篇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解释人类的生态意识如何通过语言结构的调整、词语的选择等来实现对现实的隐匿、抑制或转换实施来达到控制、操纵社会生态之目的。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目前许多语言生态学者所关注的重点。Luisa Maffi 编著的论文集《论生物文化多元化:知识与环境之链接》中所收集的论文从多个角度论述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化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依从和相互关联。美国和英国的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了全球数百个地区的土著族群和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发现“生物多样化程度高,文化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如非洲热带雨林的雨季分布与生物多样化、文化多样化、语言多样化有密切关系;太平洋婆罗洲岛上物种丰富,居住的四十多个土著民族使用着一百多种语言,因为“生物多样化的环境能形成丰富多样的食物有利于人类生存和进化;生态多样化形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促使文化多样化和语言表达多样化”,可归纳整个生态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人类对大千世界的认

识只有依靠多种多样的语言表达,而每种语言就是一种可利用的知识库。生物环境越丰富,人类可利用的知识库就越多,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也就越强。Mühlhauser 创造的一个术语“共生境”(co-virionment)栩栩如生地囊括了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共生关系。

四、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视角

我国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相对起步较晚,较多的是借鉴国外语言生态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但最近几年在语言学界有迅速发展的势头,出现了较高质量的应用研究型论文。范俊军(2005)可以说是语言生态研究理论在中国国内应用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成果归纳总结评述了国外生态语言学的种种理论与实践,也对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详尽透析,特别详细地罗列了我国境内部分濒危语言的使用和分布情况,提出了保护语言生态的对策与建议。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资料看,地球上生物多样化程度高的地区,也是人类族群文化和语言密集的地区。中国幅员辽阔,生物资源丰富,五十多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而同一民族内部的方言更不计其数,语言资源极其丰富。每种语言或方言都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的记录传承,各种生物生态区就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除汉语的方言区密集繁多以外,少数民族的世居地更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区也是语言生态区。而从语言生态观来看,语言多样性的衰退也会引起生物与文化生态的衰变。尽管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断发展,迅速与现代化、信息化接轨并在民族团结和现代化建设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目前人们正在形成的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中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语言多样性。由于目前在全球化形势下的语言大同流行趋势,评判语言能力的片面价值观都着重于对国际通用语和国内标准语使用能力的评判,使得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族